五颜六色

记忆里的上海女人

李大伟

上海女人的特点，按逻辑序列，因为矜持，所以低调。

小时候我住的地方，隔壁楼里，有不少裹小脚的山东老太，走起路来，撅着屁股瘪着嘴，拉着宁波老太的袖子：“阿娘，你侬晓得吗？”“你”是北方话，“侬”是上海话，重叠着，箍着上海话口形的山东腔：“喔刚把侬（沪语：我讲给你）听。”说明混迹上海有些年头的老上海啦，都是旧上海旧警察家属。晚上会听到夫妻吵架，女的歇斯底里，戳着手叉着腰：“妈了个×，放了个屁，你把那个骚蹄子叫出来！”好像是说给楼上听的。男的要脸面，赶紧关窗户，不敢吱声。等到我懂事后才知道，那是男的出轨了，破鞋就在楼上住，因为是机关楼——左邻右舍都是一个单位的。北方女真泼辣！先是闹，后是叫，最后一招是上吊，一环扣一环，逼得有些身份的男人不敢有下一回。

倘若是上海女人，不吵不闹，绵里藏针。这是个身边故事：女的出差，因为下雪，航班取消，只能回家，房门反锁，敲了老半天，男的总算开了条门缝，穿着睡衣，一脸惊讶。不得不让进门，做妻子的看到床单凌乱，什么都明白了，明白贱货此时只能躲在窗帘后面的晒台门外，抱着双臂瑟瑟打抖。做妻子的一声不响，慢吞吞地叠被子理被单，再从衣橱里拿出自己的东西，还是慢吞吞地叠，慢慢地理，一件一件，忽然想起鲁迅的描写，“在我家的后院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，真有耐心，晒台上忍不住打喷嚏，即便聋子也听到了，傻子也明白了，到了此时，做妻子依旧不点穿，提着箱子走了，给男人面子，也给自己面子，免去左邻右舍嚼舌头。过了些日子，协议离婚，然后出国。不吵不闹，这就是上海女人。

上海女人就是阿庆嫂，玩的是智斗，是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。她是我的朋友，他也是我的朋友，直到今天，她不会说他半个坏，根本就不会提到他，因为不屑，沉默显鄙视，沉默见涵养，这就是上海女人。打老婆不算男人，骂老公不算女人，这就是上海人的夫妻之道。

因为影视剧的歪曲，因为导演不是上海人，结果锻造出全国人民的偏见：上海女人就是花枝招展，锦缎旗袍是上海女人的虎纹豹皮“条形码”，如此装束的女人，是《日出》里的陈白露，是交际花；是会乐里号称卖艺不卖身的书寓“先生”，一旦出票叫局，鬓插大红花，衣裳缀满花，招摇过市。

上海女人，是弄堂里的，不是弄堂里的那种，大部分出石库门、入厂门口，扇煤炉、煮泡饭，是灶下婢，忙起来恨不能掮起两只脚、当一双手使唤，哪来闲工夫发嗲？发嗲是闲情逸致，偶尔为之。生活中她们的旗袍是布的，灰的，不缀花的，便于出行。

石库门里的上海女人，只有淡妆，走出一位花枝招展浓艳妆的女人，整个弄堂都会侧目以待，还以为半开门的“亭子间嫂嫂”，怎么呆得下去？宁波阿婆比划着要骂了：“格相貌、伊相貌（宁波方言：做作姿态），下作培（胚）啦。”上海女人，充其量礼拜天，斜襟上别朵小花，近腋处系条手帕，就算了不起的点缀了。上海女人的打扮，讲究“清爽相”，哪怕有补丁，干净了也是漂亮的。“不过分”是装扮第一要义，这也是矜持。

上海女人不仅会打扮，而且会烧菜，如今富庶了，依旧不妖艳，在上海女人的美学词典里，狐狸精始终是贬义词。恰如其分、独出心裁，不经意间的小点缀，以显示上海女人的传统：矜持后的低调。小车里有一双软底鞋，便于开车。太阳下撑黑伞的是外地女人，撑花伞的是上海女人；下雨天穿黑皮鞋的是金融女，穿绿套鞋的是上海女；穿衬衫露出事业线的是外国女人，露出白皙长颈的是上海女人。交际场合，面对外地同事说普通话，看到上海人说上海话。看到中国人，说英国话的，是陆家嘴的商务楼女人，但不是上海女人。上海女人就是恰如其分，待人接物，不温不火，从容不迫，无形间弥漫着距离，透露出矜持。

什么叫矜持？三十年前的老话解释：就是搭架子。过分了就是豆腐架子。上海人称孩子他妈，既不是老婆，嫌粗俗；也不是夫人，嫌做作，而是“架子婆”，一语道出上海女人的矜持。

奥地利的元宵节

陈春萌

女儿转入维也纳的幼儿园不久，学校邀请家长参加灯笼节活动。老外称中国的元宵节为灯笼节，而奥地利的这个传统节日，据说是专属小朋友的。

那日傍晚，我去幼儿园接女儿一起前往活动地点某公园，她提着一盏简易的木头灯笼给我看。灯笼四面糊着纸窗户，纸上则是漂亮的涂色，一看就知是女儿的细致画风，老师已经在灯笼底座安了一支大蜡烛。等所有家长孩子到齐后，老师宣布纪律：本次活动小朋友的安全由各家长自己负责，如果要接电话或者离开一下，请把小朋友交到老师身边暂管。天色渐暗，家长老师帮忙点上蜡烛，小朋友提着自己的灯笼，跟随大部队浩浩荡荡走向公园深处的大草坪。

大家在草坪围成一圈，两位生活老师给每个家庭送上歌谱，这是小朋友近几周为这次活动新学的几首歌，音乐老师拿着吉他伴奏。当唱到马丁之歌时，老师安排了舞台表演，两个小朋友做桥，一个小朋友蹲在地上扮演穷人，一个小朋友演马，一个小朋友披着红披风拿着剑饰演马丁。小马丁拉着马的缰绳穿过了桥，看到了路边的穷人，便用剑把自己的披风一分为两片，一片给穷人披上，然后又骑着马离开了。表演完一遍后，老师邀请其他小朋友自告奋勇也上台表演一遍，大家给他们伴唱。显然表演的形式很吸引小朋友，在又唱完一遍后，连德语不太好的女儿也自己跑上去说“我也要”，等老师分配下一轮的角色，表演完后，老师跟每一个小朋友说谢谢。最后一轮，老师邀请家长上去表演，参与的家长即兴发挥，用夸张的动作把孩子们都逗笑了。简单的歌曲配上简单的表演，老师用情景体验的方式让小朋友们明白了什么是救助行为。有意思的是圣马丁帮助穷人时，并不是在大冷天牺牲自己，把披风全给穷人，而是将披风割一半给他。也许这个故事传达的并不是要追求多么伟大的舍己救人精神，而是易于做到的分享理念。

唱完演完笑完，老师开始分发食物，每个家庭分享一个比脸还大的弯面包，还有自制的儿童潘趣茶。深秋初冬，喝上一杯热饮真是身心舒畅。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学校邀请家长出席的特别活动，每次老师从内容到饮食都是精心安排，请柬必定是和每个小孩一起制作的，食物也常常是和小朋友一起准备的，而家长真的只要活动当天参与就行。

话说灯笼节传递的救助分享理念还不仅仅只是如此简单的一次活动。节后一星期，老师安排了一次捐献活动。可捐献的物品不仅有规定的品种范围，还特别强调必须是小朋友自己能够提得动的东西。小朋友们背上自己捐献的物品，去了一个求助站，每个人亲手把东西交给工作人员。和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元宵节相比，奥地利的灯笼节让我们觉得很轻松，也很有意义。

枫叶书签

胡海明

在整理藏书的时候，一枚枫叶书签从书中飘落下来。从地上捡起，仔细端详，我陷入了沉思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刚刚踏上工作岗位，是个要吃三年萝卜干的学徒工。因为喜欢新闻写作，所以就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办的新闻学自学考试。一周要去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上两次辅导课。因为家住老闵行，因此每次碰到上课，下午三点多就要从老闵行坐上徐闵线，到了徐家汇再转其他公交车到达学校。也就是在上辅导课的时候我认识了美丽善良的雯。雯告诉我，她在玻璃厂流水线上做装配工，一天隔一天翻夜班，很辛苦的！但雯同样喜欢新闻写作，工余时常为一些报纸投稿，但泥牛入河杳无音信。她觉得需要系统地学习，就报名参加了新闻系的自学考。当得知我从老闵行赶过来的时候，她哇了一声：这么远啊！脸上满是惊讶，似乎老闵行等同于西伯利亚。确实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公共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多元发达，从老闵行去市区，公交出行只有徐闵线一条线，虽然老闵行行政管理属徐汇区，占的也是市区的名分，但它在人们的眼里属于“都市里的村庄”。

雯的家住在普陀区，下课后，雯和我同坐133路公交车，然后转其他公交车。我们走在弹硌路上，聊着各自的抱负与憧憬。因为我在报纸上发表过两篇豆腐干文章，从雯的语气里可以听出一点崇拜我的味道。我有些沾沾自喜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很幼稚。

分别的时候，我们各自留了单位里的电话号码。雯走了没几步，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别转身朝我走来，从帆布书包内取出一本书，从书的内页里取出一枚已经风干的枫叶笑着对我说：这片枫叶是我去年到北京时带回来的，做书签挺好的，送给你。

回到家，我从书中取出那枚泛着红色的枫叶，不由得想起唐代杜牧的诗：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

认识雯以后，我对一周两次的辅导课特别期待，总觉得想对她说些什么，但又彷徨着不知从哪个话题切入。

辅导课结束的那天晚上，我和雯走向公交站点。这一次，我和雯交谈，隐隐感觉她的口齿有点含糊，但又不敢问她究竟何故。

那天上午是自考日，我和雯是一个教室，但那天她的课桌却空空的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我按照雯留给我的单位电话号码打过去，接电话的工友告诉我，她病了……

我期待着雯能给我回个电话，因为我关照那位工友了，但我终究没有等到雯的回电。当时，对雯的情况我作了N种的假设，但始终未能得到求证。雯在我和她的有限的记忆里还是“短路”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进了一家区级纸媒，算圆了新闻梦，也发表了一些文字，但我始终没有触及我和雯的那段话题。虽然时间久远，记忆深处对雯的印象还是清晰的。

看着书签，我就在想，如果这个电话今天响起，我和雯之间不就是一部很好的“穿越剧”吗？里面的结果不过是“潜伏”着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把这个故事的结局写成一篇文章……

鸡年吃鸡

霍无非

鸡年首日是初一，在单位值班的我，晚上约一班过年回不了家的同事在餐厅小聚。

上的菜有两样是鸡，一种是粤菜中的豉油鸡，皮滑肉嫩，淡咸微甘；另一种是红烧土鸡，一位皖籍同事捎来家乡土鸡，宰杀后提示制作要点，由粤籍师傅烹制，里面放了香菇姜葱干红椒，重油重色，微辣醇香，肉质筋嚼，很有几分徽菜的范儿。

大快朵颐间，师傅过来，众人齐夸鸡做得好，尤其对外帮菜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师傅说，那是食材好，本地的鸡还做不出这一口。由此可见，食材在烹饪中的重要性。联想到一条俗语，先有一方水土出一方材，而后才一方食材养一方人。这说明：任何局部的品质，都关乎整体的成色，淮北生“橘”，只能坏了名声。鸡年首日吃鸡，吃出这样一番意味。

慧智快餐

郑辛遥

师授之道：做难事必有所得。

灯花

走出“不考不教”的误区

徐亚斌

近日，一则新闻引起了笔者的关注。在国家举行的学生体质测试中，沪上高中男生『引体向上』的成绩很不理想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『引体向上』只是一个体质测试项目，非正式考试项目，于是，许多学校就不把它列入教学内容。而且，不少学校已经难觅单杠的踪影了。

好一个『不考不教』！笔者不知道国外的情形如何，就我国而言，这似乎已是一个『传统』。这里不想探讨这种考试制度的利弊，但在今天，我们依然顽固地坚持着这种『传统』，该是多么的『不合时宜』。

事实上，国家制定考纲，规定各种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式，这并不是说，有些内容因其考试方式特殊而允许我们不教。早在二〇一四年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上就严肃指出，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的现象依然严重，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。可见，考什么就教什么，非政府之意愿，而是学校自行为之，其后果势必会偏失一些『非考』科目和『非考』知识，已经给社会和学生造成了损害。

总而言之，『考什么』就『教什么』风气的盛行，会严重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，继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人才结构的合理性，久而久之，则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竞争力。希望这不是『危言耸听』。

七夕会

“春晚”上的“美丽冻人”

陈桂兰

2017年央视春晚上海分会场，在歌曲和旗袍秀《紫竹调·家的味道》中，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姐妹们演绎的一场旗袍文化视觉盛宴在13亿中国人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她们是一群“美丽冻人”的海派旗袍文化传播使者，520位姐妹唱响了“我爱你——我的家……我的祖国……”

一曲终了，余音袅袅。

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回想起已经过去了的是多少个梦幻般的排练之夜。从午后的阳光映照到次日凌晨的天寒地冻，我看着姐妹们裹着寒风、顶着雨淋、迎着飘雪，她们犹如迎春的蜡梅花竞相绽放，让所有喜欢她们的人为之动容。

这其中有这样一枝引领她们的“腊梅”在排练时永远站在台上，在演出时却走到了台下，她，就是这场海派旗袍秀的总指挥、市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会长张丽丽。

张丽丽是位体态优雅的女人，虽个头娇小，气场却很大。接触过她的所有姐妹没有一个不佩服她的，我也深深地被她的举止打动了。参加演出的海派旗袍文化大使吴尔愉告诉我：“张会长凌晨1点多还在给我发微信，安排今天明星到场排练事宜。”副会长严琦说：“她凌晨2:30还给我发微信安排工作，因为早上9:30所有姐妹要到现场排练，怕来不及只能马上开始一一通知在熟睡中的其他姐妹，为此吵得躺在一边的老公睡不着了，也被动员起来一起打电话。”副秘书长姜为民说：“她凌晨3:30还在给我们发微信安排当天的摄影、摄像等宣传工作……”

在排练期间，正逢上海市人代会召开，张丽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，又是浦东代表团的副团长。她兼顾两头，白天开会，傍晚赶到排练现场。张丽丽说：“由于央视春晚导演组要兼顾全国东西南北四地分会场的节目特色，而上海分会场导演组接到指令后要连夜研究并细化方案，轮到给我们布置工作时一般都在每天凌晨的1:30以后，或发微信或通电话，有几次是在凌晨二三点。”

要为520位姐妹工作，还包括把明星、外国留学生、台胞姐妹安排好、服务好，这是个不轻松的工作。然而这是一个组织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团体，520位姐妹被分成了6个团28个支队，加上为姐妹服务的项目组、宣传组、保障组的志愿者们，560来人，一大家子，20来天里几乎天天穿梭于东方明珠塔下，多么不易！

20来天里，张丽丽每天几乎凌晨后入睡，好多天只睡二三个小时。在她的精神引领下，我们谁都不甘落后，甘愿吃苦受累。于是，孩子仅出生四个月的妈妈带着吸奶器坚持排练，有的是企业的老总推掉了年关的事务也来了，还有好多姐妹数天排练冻得感冒了，吃着药上阵……560多人，个个都是志愿者，她们的年龄80%在45岁以下，其中许多还是80后、90后，年龄最小的还是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呢！正值春节回家过大年的时候，好多人退掉了还乡、出国的车票、机票，留了下来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我与姐妹们的年夜饭，竟然是盒饭！我们都有着一个信念：展示海派旗袍文化魅力，展现上海女性时代风采。

上海海派旗袍秀节目在2017年央视春晚精彩绽放了，我们520位姐妹一致认为：“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了我们传播海派旗袍文化的自信，是梦想与责任给了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……我们感谢，感恩！”

雅玩

夜光杯